

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

# 军事作用与国家形成

## ——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

杨 英

**【摘要】** 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强调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军事作用,在此视角下的一些解释建立了军事作用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因果链条并提出了因果作用机制。这些解释认为,战争、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等军事因素导致了国家形成,而这些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差异,则又导致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产生。在这个视角下,一些学者认为,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具有一般性,另一些学者则具体地指出,军事要素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新生代的国家形成理论认为,老一代的国家形成理论有过时性,他们或者强调更复杂的现象,或者提出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不适用。

**【关键词】** 国家形成;军事作用;集权官僚国家;代议官僚国家;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 D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27(2013)01-0060-08

**【作者简介】** 杨英(1980—),男,新疆石河子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政治与军事政治学研究。

## 一、引论

为什么历史上的国家大都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形成中什么要素至关重要?这个要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上,一批学者强调国家形成的“军事问题”<sup>①</sup>,认为军事要素造成了现代国家形成。克劳塞维茨、恩格斯、马克斯·韦伯、诺贝特·埃利亚斯、奥托·欣茨、迈克尔·曼、佩里·安德森、塞缪尔·费纳、威廉·麦尼尔、贾恩弗朗哥·波齐、查尔斯·蒂利、布莱恩·唐宁、理查德·宾、许田波、维克多·伯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均在此列。他们认为战争、军事技术、军事组织等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这群学者普遍强调军事要素,波齐将之归纳为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sup>②</sup>不过,如果以是否形成了因果解释来评判的话,早期的军事视角中,韦伯、克劳塞维茨等人的解释,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因此,本文主要对麦尼尔、唐宁、蒂利、费纳、波特、许田波、伯克等学者的理论作以分析。他们建立了“军事作用—国家形成”的因果解释链条,并精湛地分析了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通过什么影响机制以及如何起作用。文章接下来将用三个部分呈现这些学者的解释逻辑并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军事在国家形成中的一般作用的一些解释;第六部分聚焦于讨论中国国家形成的一些解释;第七部分是新生代理论的探讨;最后的结论作为第八部分。

## 二、富裕且强大的欧洲国家因何形成

从全球视野来看,大约在16世纪,东方和西方在国家形成上出现了重大的分野,西方形成了强大且富裕的国家,而东方却长时间停滞不前。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异?什么造成了西方欧洲国家的形成?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中,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由军事要素尤其是军事技术导致的。此中,杰弗里·帕克和麦尼尔的贡献最为突出。杰弗里·帕克强调国家形成与战争形成之间的相互刺激关系,“国家制造战争,但战争也创造国家(states made war but wars also made states)”,<sup>③</sup>而使这种关系得以建立的则是军事技术。军事技术

革命塑造了西方欧洲国家强大且富裕的模样。欧洲通过 16、17 世纪的军事技术革命获得了军事优势并形成了霸权。<sup>④</sup> 麦尼尔从对东方中国的描述开始他对东西方国家形成差异的解释。他认为公元 1000—1500 年是中国称雄的时代,这个时代形成了富裕且军事技术先进的东方中国。但在蒙古人统一欧亚大陆的军事过程中,东方的军事技术被转移到了西方欧洲。欧洲国家在军事技术的获取和拥有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竞争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变革,“技术和组织革新继续进行,使欧洲人能够越来越明显地超越地球上的其他民族”,<sup>⑤</sup> 形成了明显比东方国家强大的欧洲国家。很明显,他提出的因果关系链条是:军事技术—欧洲国家形成。但是,这种解释会直接遭到质疑:早在欧洲之前,中国等东方发达国家就已经有了先进的军事技术,为什么中国没有在从 16 世纪开始形成欧洲式的现代国家?对此,他的解释是,那时的中国缺少军事技术的作用机制——市场制度和市场经济,而欧洲国家却有。在欧洲,市场制度和市场经济,促成了军事的商业化,大大提高了军事技术的效率,导致欧洲远远强于东方中国。市场经济也使欧洲国家变得富裕,这又导致了欧洲在经济上追赶上并超过了东方国家。由此,形成了既强且富的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形成中,军事技术和国家的富裕强大之间发生了良性循环:军事技术的发展带来技术发达、训练精良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能建立的更高水平的秩序,使得农业、工业、商业有了通过市场获得发展的机会,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去发展军队,这样一来,军事技术和国家的富裕强大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循环。在欧洲内部,瑞典、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都在某个时段因为军事技术先进,而成为欧洲强国,军事技术的竞争从整体上刺激了国家的官僚化、军队控制技术的改进,后来的工业革命则从整体上升级了战争的形式,使战争变成一个工业化体制。在工业战争时代,后起的普鲁士德国凭借发达的铁路、新的通讯手段、快速的部队供应及部署即可获得战争优势,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获胜。相对于东方,装备了先进军事技术的一支小型欧洲军队可以轻易打败东方大国。麦尼尔的军事技术概念指称的是整个军事技术系统,这个技术系统中有武器技术、攻城火炮、作战工事、训练技术、武装力量的控制和管理技术、也有战争技术。<sup>⑥</sup> 但是问题在于,所有的军事技术都起作用吗?什么技术对欧洲国家形成是至为关键的?理查德·宾(Richard Bean)提出了更精确的解释,他同样认为军事技术造成了国家变迁并最终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sup>⑦</sup> 但他剔除了军事技术的其它内容而将军事技术种类降低到一种——火炮技术。他的解释认为,火炮技术刺激了大规模军队的出现。15 世纪火炮技术的改进使得战争的各项成本攀高,致使军事胜利依赖于军队的规模经济能力。国家形成则表现为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国家的形成,军队规模小的城市国家被淘汰了。

从整体上而言,相对于东方国家,规模大、军事能力强、经济富裕的欧洲国家的形成,通过军事技术基本得到了圆满的解释。然而这只是在全球视野范围内基于东西方差异框架的解释。如果进一步缩小研究范围,放大欧洲国家内部的话,欧洲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样是富裕且强大的欧洲现代国家,英国形成了代议制国家、法国形成了专制国家、普鲁士德国发展成为军事官僚制国家,意大利则长期处于封建城市国家状态。这些差异因何而形成?军事技术解释对此就无能为力了。这需要精细一些的解释。首先,对于欧洲现代国家的差异,我们需要一个分类框架,而对于欧洲诸现代国家差异的分类,托马斯·埃特曼的分类框架可能更适合本文,埃特曼把政治国家分为四类:<sup>⑧</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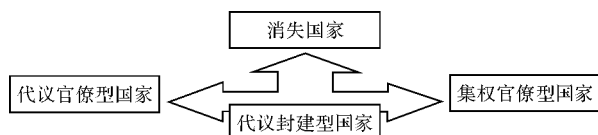
		政权		
国家基础结构的特征			绝对主义(行政管理式)	宪政主义(参与式)
	1450 年以前	世袭制	世袭绝对主义	官僚宪政主义
	1450 年以后	官僚制	官僚绝对主义	世袭宪政主义

本文对此稍作调整,根据国家分别在政治层和执行层的不同,将现代国家作了两重划分:根据国家在政治层面是代议性的还是集权性的,本文将国家分为代议国家和集权国家;根据执行层面是官僚制的还是封建性的,本文将国家分为官僚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官僚制度国家有一个作为执行机构的中央政府官僚系统,封建制国家在执行上则分属到各个割裂开来的地域,没有中央官僚机构。如下表所示:

	官僚型	封建型
代议型	代议官僚型(英国、瑞典、波兰等)	代议封建型(城市国家、欧洲国家形成前的普遍状态)
集权型	集权官僚型(德国、法国、西班牙等)	集权封建型(消失国家或者转型国家)

这四种国家类型在历史进程上有不同的位置,代议封建类型是其它三种类型的历史起点,其它三种类型

皆由此类型演化而来。欧洲最初领地林立,古老的代议习俗深植于政治体系中,欧洲各国均呈代议封建状态,各国也均由代议封建状态作起点而形成现代国家:或者形成代议官僚型国家、或者形成集权官僚型国家,或者由于集权与封建不能同时存在而致使国家形成表现为消失的国家或者转型状态的国家。欧洲国家形成的发展路向可以简示如下:



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分析的重点主要是集权官僚型国家形成和代议官僚型国家形成。因此,本文的分析也主要聚焦于这两类国家形成。

### 三、欧洲集权官僚型国家的形成

集权官僚国家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也称作王权国家、集权主义国家或者绝对主义国家。恩格斯称之为王权国家。在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中,恩格斯可能是此领域中最早的开拓者。遗憾的是,国外甚至国内很多研究国家形成的学者大都把他的这一贡献遗忘了。1884年,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很好地解释了军队组织类型对王权国家的形成影响。国王军队相对于封建军队的组织结构优势使军事胜利偏向王权,促进了王权型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于军队组织类型之间的差异与相对优势,恩格斯在其更早一些的著作1855年的《欧洲军队》中已经做过详细的研究和比较,通过对各国军事组织的组织编制、兵种结构、组织作战的特点、作战技术的比较和分析,他认为法国军队是当时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军队。<sup>⑨</sup>而法国的军队组织优势恰好与当时拿破仑法国王权国家高峰对应。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为了打破封建贵族在军事上的垄断、摆脱封建领主骑士组合成的军队,国王建立了自己的军队,由国王招募或雇佣的军队不断增加。<sup>⑩</sup>封建型的军队主要由骑兵组成,而国王的军队中步兵逐渐成为主体,再加上弓箭和火药等军事技术装备的炮兵等兵种结构革新的应用,国王军队有效打败了封建骑士型的军队,形成了王权政体的国家。恩格斯的这些理论基本解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王权国家的形成,他几乎在军事技术解释尚未提出时,就提出了更能解释国家形成的政治差异的解释,如果放到军事视角的国家形成中来看的话,这个贡献是惊人的。

恩格斯无疑解释了在集权官僚型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军事组织类型是至关重要的。唐宁则进一步从军事组织的变化情况进行解释。他把军事组织变量操作为军事组织革命的有无发生。发生军事组织革命,则集权官僚型国家形成。唐宁把集权官僚型国家描述为军事官僚制的绝对主义国家并建立起军事组织革命和集权官僚型国家形成之间的因果链条:军事组织革命—军事组织官僚制国家形成。军事革命是解释中的关键变量,发生了军事革命即弱小、分散、自我装备的领主军队被规模大、由中央财政装备和支持、武器复杂昂贵的军队替代的国家中,军事强化了国王权力,建立了威权统治甚至是军事—官僚绝对主义体制。<sup>⑪</sup>这个因果关系是通过什么起作用呢?他认为是战争。战争会带来财政支出和征税冲突,国家面临的战争程度重,需要大量动员国内资源,并且战争的财政紧张,则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国家形成。

埃里亚斯沿着韦伯的传统,将国家形成看作是对领土和人口的垄断,并提出战争变量的解释。国家形成的因果作用机制则表现为“垄断机制”和“国王机制”。战争不断形成对更大地域内的军事和财政的垄断,某个领主首先打败某个地域内的其它领主,形成领主霸权。<sup>⑫</sup>这个战争显然首先是内战。布鲁斯·波特也认为不仅仅是国家间的战争,内战对国家形成也有影响作用,<sup>⑬</sup>内战胜利的一方也就是埃里亚斯理论中获得领主霸权的一方成立中央政府并建立对暴力的垄断。不过,埃里亚斯的解释更为精细。他的解释认为,领主在获得霸权后,就不再允许其它人有获得霸权的机会,他们垄断了“支配地位”,接着将这种私人垄断逐渐转化为有大量助手参与的公共垄断,私人垄断机关衍生成由专业化的并垄断了税务、军队、警察等机关的中央机关,由此造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形成。这一解释直接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中世纪早期甚为松散的社会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内部基本保持和平,武装起来一致对外的、被我们称为‘国家’的社会?”<sup>⑭</sup>。而集权官僚型国家因何能形成呢?法国集权官僚型国家的形成为什么早于德国,为什么比较富裕?埃里亚斯认为这与其提出的因果机制——“垄断机制”和“国王机制”发挥作用的程度相关。法国和德国宫廷专制时间都比较

长,但是,法国宫廷专制经过淘汰只剩下一个大宫廷——国王宫廷,税收和财政都集中于国王,官僚化较早,较早拥有了中央官僚机关。国王由于对税收能独家垄断,所以有税收最大化的能力,而税收最大化依赖于商业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于是法国形成了富裕并且中央集权的国家。德国虽然宫廷专制也比较长,但是宫廷淘汰程度不高,多个宫廷并行,每个宫廷都虽然专制但却经济拮据,结果形成了专制却穷困的国家。

波齐认为现代国家形成是以战争为中心的。“从一开始,国家就集中关注两种组织暴力(有时候是重叠的)行使:属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暴力;属于单个国家内部控制人口和维持秩序的暴力。基本上,这些暴力发展为日益强大和复杂的国家机器,建立和使用军队,保护领土安全,阻止和惩罚社会越轨行为,镇压社会叛乱……国家机器也是通过垄断征集各种税收的工具……在所有的国家活动中,战争准备和战争活动仍然是整个国家活动发展过程的核心。”<sup>⑤</sup>集权官僚型国家(他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战争的刺激。“主要是为了不断提高的战争成本的需要,每一个重要的欧洲统治中心,在数十年中、数个世纪中,不得不从它所统治的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建立越来越精致的财政制度,征集越来越广泛的统治设施。”<sup>⑥</sup>绝对主义国家因此而形成。其中的传动机制则表现为:以战争为中心的国家,优先发展内外部暴力机器,为此而取消了议税传统,打破了国家收税必须经过被征者同意的限制程序,结果,中央财税机关控制了财政,并由此扩展为一整套官僚体系。官僚税务机关的发展会增加资源汲取,而增加的资源汲取又会进一步强化绝对主义。集权官僚型国家因此形成。

以战争解释集权官僚国家形成的还有波特、蒂利、埃特曼。波特的解释认为战争导致了国家形成,集权官僚国家(他称为内陆路径的国家)的形成是由于战争发生了集中效应(centralizing effect),内战削弱了边缘领主,相对强化了中心领主的势力。中心领主的优势形成后,军事组织机构、财政革命、集权化的官僚体制进一步强化中心领主的势力,这两重强化都有助于形成更优质的军队,更优质的军队则拥有更强国家形成能力。如此,造成了波特命名的内陆路径的国家形成,西班牙和法国的国家形成均是此种路径,勃兰登堡—普鲁士德国的国家形成则是形成了比其它制度更适应战争需要的中央化的集权官僚体系。埃特曼也以战争解释国家形成,但他提出的因果机制却明显不同于其他学者。埃特曼以加入战争的时机作为解释机制。战争进场时机靠后的国家有充分的机会发展官僚制体系、利用官僚制体系为战争服务,因此造成了集权官僚国家的形成。普鲁士德国很早就有代议机关,制度化的代议机关则首先出现在1465年特里尔当选大主教的事件中,<sup>⑦</sup>后来代议机关一度掌管了赋税,但是相对而言,从宫廷组织中衍生的中央官僚组织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埃特曼以普鲁士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普鲁士德国创立了财政军事体制、新的征兵制以及战争专项资金等各项适应战争需要的制度,代议机关反而为战争的金融问题耗尽了信誉而被削弱。在此过程中,集权官僚国家(他称为官僚绝对主义国家)形成了,而这个国家形成直接来自于战争的影响。蒂利也以普鲁士德国为典型案例分析集权官僚型(他称为强制密集型)国家的形成。普鲁士德国在富有强制但缺乏资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sup>⑧</sup>战争导致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军事开支超出了国王日常收入的支付能力,国家被迫发展长期税收体制以支付战争,强制性地汲取资源成为国家主要而且长期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逐渐剔除了各种税收经纪人,把以前的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中央官僚机关的统治,国家因此也变成强制且拥有中央官僚的国家。

佩里·安德森把集权官僚国家描述为绝对主义国家,并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在整个欧洲无论是西欧、东欧还是南欧都广泛存在。他按照地理位置排列出了从西欧到东欧的绝对主义递增谱系。在整个绝对主义国家形成谱系中,战争是重要的变量。绝对主义在中欧和东欧增加是因为遭遇了强大的外来军事危机。瑞典军事扩张这一外生性的军事危机迫使普鲁士德国、俄罗斯、奥地利建立绝对主义体制。西欧主要是在内部领主与国王的战争中,由于国王垄断性获胜而建立了王权绝对主义国家形成。在整个绝对主义系谱下,国家都主要是为了战争而组建的机器。<sup>⑨</sup>战争是取得剩余产品唯一的、最合理、最快捷的扩张方式,在战争诸多形式中,征服战争相对最为重要,征服战争在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

斯考切波呼吁“把国家带回来”,是最近国家研究热潮中的领军人物,她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建立了军事危机—国家形成的因果链条,<sup>⑩</sup>各种军事危机尤其是战败导致了革命国家的形成。战败导致原来的政治制度结构瘫痪,引发系统性的社会变革,<sup>⑪</sup>造成革命国家的形成。由于革命国家很大程度上带有集权性质,革命国家的形成也是一种集权官僚型国家形成。

许田波认为“‘战争创造国家’这个过程最可能的结果是产生一个绝对主义国家而不是宪政国家”,而“战争

创造国家的途径是：摧毁封建的、分割的权威，通过暴力手段垄断化、税收全国化和行政机构的官僚化来创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理性化的权威。”<sup>②</sup>战争与集权官僚型国家（她称为绝对主义国家）形成通过一个影响机制——支配机制起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内盛行的是支配机制、采取的是“自强型改革”并且能战胜社会的制衡机制和行政成本机制，就会形成集权官僚型国家。中国的春秋战国体系盛行的是支配和强制机制，替换了宪政谈判，最终形成了集权官僚型国家。而欧洲体系中，普鲁士、法国、俄国则积累起了强制能力，也形成了此种国家。

伯克把战争放入到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中，认为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战争造成了国家的形成。欧洲经历了集权化文明—中世纪非集权化文明—现代集权化文明的发展过程，现代国家则形成于现代集权化文明发展时期。集权官僚国家（他称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在东方伊斯兰文明中则早已有之，而在欧洲文明内部也是普遍现象。比如英格兰在诺曼征服之后即开始了中央集权进程，之后的各个国王都致力于创建现代法庭、国库、财政体系、行政体系建设；德国则在腓特烈一世、腓特烈二世时期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sup>③</sup>为了集权，各中央集权体系与其地方分权的诸侯之间不断战争，同样的原因，欧洲的中央集权体制、蒙古的集权体制、伊斯兰的集权体制之间也发生激烈的战争冲突，每个文明都变成其它文明集权的对象，集权官僚型国家在更宏大的文明层面也被推动，导致了集权官僚型国家的普遍形成。

#### 四、欧洲代议官僚型国家的形成

以上大多数解释欧洲国家形成差异的学者出于其解释差异的目的，在解释集权官僚国家形成时，大都也解释了代议官僚型国家的形成。不过，比较不合理的是他们用的解释变量基本没变。军事组织的解释中，唐宁尚能以区分军事组织革命的有无来解释两类国家形成的差异，未发生军事组织革命的国家中，原有的封建代议传统未被根本颠覆，议会权力得到保留并发展出了一套议会控制的官僚系统，使得国王即使在战争财政紧张时期也无法强制性地征税，专制王权受到了约束和限制，因此，形成了代议官僚型的国家。但是，以战争变量解释国家形成的波特、埃利亚斯、许田波等人却仍继续以此变量解释代议官僚型国家。在他们的解释中，同一个战争变量产生了两种差异很大的结果：集权官僚型国家形成和代议官僚国家形成。这无疑是个重大缺陷，然而目前似乎尚无学者指出这一点。之所以说它是缺陷，是因为如此解释下去就必须通过因果影响机制的差异来解释国家形成的差异，比如，埃利亚斯用“国王机制”和“垄断机制”发挥程度的差异；波特则是用战争本身的不同效应机制解释；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者的解释均是案例解释，在没有足够的实证证明的情况下，所谓的影响机制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变量或者中间变量，这将直接导致原来解释变量解释力的失效。国家形成结果的发生，很可能是通过这些学者所谓的“影响机制”而不是其解释变量形成的。也就是说真正的解释变量可能是这些影响机制。这其中，蒂利大概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直接以加入新变量——资本变量的办法寻求解释上的圆满；不过，对于本文来说，既然前文已经默认了这些学者的解释变量在解释集权官僚型国家上的效力，那么分析他们对代议官僚型国家的解释，重心就必须放在他们提出的各种影响机制或则新变量上。

埃利亚斯认为战争的“国王机制”和“垄断机制”作用发挥差，导致了代议官僚型国家的产生。在英国，宫廷专制阶段时间短，由于是岛国，比较重于发展海军，而陆军和集中化的警察不发达，国王宫廷专制弱，市民阶层和商业势力强大，因此未能垄断税收。市民阶层和商业阶级得以自由向外发展，海军则被用于拓展海外殖民地，最终英国形成专制垄断弱、富强、代议制盛行的国家。波齐通过阶级形成机制解释代议官僚型国家的形成。以战争为中心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如果强大并控制了议会的财税权力，则会形成代议官僚型国家。代议官僚型国家对权力有强烈的限制，最后所形成的是一个权力受限制的国家。为什么能形成这种国家？仍是阶级形成机制起作用：在资产阶级背后存在着民众阶级，当民众反对资产阶级并获得代表权时，就形成了对国家活动以及市场原则的限制。如此，权力有限的代议官僚型国家形成了。布鲁斯·波特通过战争的效应机制解决上述问题。战争有三大类效应：形成及组织效应、分崩效应、改良效应，每一类效应又包括了许多子效应内容。他以英国为典型做过解释。英国的国家形成中，战争的官僚化效应和集权效应混在一起。英国没有发生财政革命，由于海峡的保护，没有外力威胁，战争的集权效应也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多次的战争却使战争的财政崩溃效应发挥出来，加上英国中产阶级力量、议会力量相对强大，古老的宪政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在财政压力下，国王为换取对战争的财政支持，被迫在议会框架内改革宪政，承认宪政权利。财政崩溃效应导致了代议官僚型国家（他称为宪政路径的国家）形成。波特的战争变量本身是有历史类型限

制的,他把战争分为宗教战争、民族战争、工业战争。宗教战争和新教改革产生了现代国家的早期形式:或者为宪政主义或者为绝对主义的王朝国家;18世纪一系列的民族战争,制造了现代国家的第二阶段的形式:民族—国家(nation-state);滑铁卢战争后,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的工业化战争(凭藉激烈的社会和经济动员)产生了现代国家的第三种形式:集产主义国家(the collectivist state)。<sup>④</sup>战争变量对国家形成的作用在解释时需要逐一对应。许田波虽然认为战争最可能创造出一个绝对主义国家,但是她同时也认为战争创造出什么类型的国家是难以确定的,<sup>⑤</sup>而这种不确定来自于影响机制的不确定。代议官僚型国家(她称为代议制国家)形成的关键要看是不是出现了制衡机制和行政成本机制。比如英国,英国国会对政府的监督导致分权与制衡,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所以形成了代议官僚型国家。蒂利引入新变量——资本变量来解释代议官僚国家的形成。战争虽然形成欧洲国家,但是当国家资本快速集中或者积聚后,资本有能力与战争所产生的强制拥有者讨价还价,其结果是两方面达成妥协,最终形成了代议官僚型国家。<sup>⑥</sup>

## 五、军事要素在国家形成中的一般性作用

对于军事在国家形成中的一般性作用,费纳认为军事作用与国家形成之间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国家形成也受其它诸如社会分层、忠诚观念等的影响,但是他依然提出了军事样式(military format)的纵向发展和国家形成纵向进程之间的勾连关系。他认为国家行成中有多个相互勾连的变量簇,他称之为循环(cycles),每个循环内有多个相互作用的变量,而各个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构成以每个循环为变量的作用系统。每个欧洲国家的形成都由几个或者全部的这样的循环构成,而所有欧洲国家形成中,军事样式要素都贯穿国家形成全过程,<sup>⑦</sup>是所有国家形成最重要的变量。王国斌对战争要素在欧洲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提出过一个一般性的解释逻辑。国家之间的接触导致竞争,竞争使每个国家都面临国内秩序和对外关系的挑战,国内秩序经常居于相对次要地位,居第一位的挑战则是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所发动的军事攻击所形成的压力。军事压力迫使国家发展军队,发展军队需要增加新税以扩充财政收入,扩充财政能力又需要创造新的官僚机构,这又带动了国家组织能力的增加。<sup>⑧</sup>如此,各链条连环形成了现代国家。蒂利以强制密集还是资本密集把国家形成整体上分为三条道路:强制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化强制,最后只有强制密集型和资本化强制型的国家生存下来,而这两种国家形成无论哪种,军事力量即强制要素都起到关键作用。强制的诸要素中,战争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将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双向互动总结战争与国家形成的一般关系。战争不仅影响国家形成,而且战争与国家形成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循环,战争形成国家,国家也形成战争。战争在内外两个意义上造成国家形成:“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sup>⑨</sup>战争的压力使统治者,建立了常备军队、各种常规化的国家部门等一整套现代国家装置;欧洲国家的组成部分:国库、法庭、中央政府等都是战争的副产品,是为创建和支持武装力量而进行的一种努力。战争频繁,没有国家能凭侥幸活下来,国家必须具备战争能力。战争创造了国家,国家同时也创造战争,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和冲突使国家始终卷入战争之中。现代国家一般是在国家与战争的双向互构中,形成的。波特也认为虽然国家形成有各种类型,形成机制也有差异,但是无论哪种形成都有军事基因存在。他甚至认为整个现代政治的根基就是军事。<sup>⑩</sup>

迈克尔·曼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一般的解释。他从更抽象地意义上以军事权力的作用解释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他把人类社会抽象成由四种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的社会,从而提出由这四种权力构成的模型。军事技术、战争、军队、内战等复杂的要素都被抽象成军事权力作为现代国家四维权力中的一维。军事权力对国家形成的作用则是以军事发展的方式引导国家规模的巨大增长,同时使社会生活政治化。<sup>⑪</sup>

## 六、欧洲偏见与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因何形成

国家形成理论领域最早由欧洲学者开拓而出<sup>⑫</sup>,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麦尼尔、蒂利等人军事视角的解释都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下进行。王国斌、许田波极力挑战这一偏见。王国斌提出一种互为中心的方法,他把战争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放在中国和欧洲双向比较中去解释。许田波则把欧洲现代国家形成和中国春秋战国的状态对应。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在现代中国国家形成中,军事是不是也影响国家形成?如果是的话,这种影响是由于受到欧洲军事影响所造成,还是来源于中国国内

自身的作用机理？彭慕兰承认了欧洲的军事竞争在欧洲之外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海外扩张的影响。彭把海外扩张看作是欧洲内部军事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引起了军事进步和战略的重大进步，从而使欧洲人能够弥补他们漫长的供给线及规模有限的海外军队带来的缺陷。”<sup>③</sup>但是，她同时也强调，欧洲军事竞争在欧洲以外的影响仅仅适用于“新大陆”，在“旧大陆”——亚洲，则不能仅仅归因于欧洲的军事成功，而是部分地还归因于亚洲的自己的弱点。根据她的这种解释，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个提示，中国国家形成中，可能独立地存在着军事因素对国家形成的影响作用。让我们聚焦到中国，看看以中国为案例讨论。

从军事的三大主要代表要素：军事技术、军事组织、战争来看，从16世纪开始，军事技术相对于西方呈劣势下降，一直到解放建国时期，中国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军事技术优势。从中国自身的军事技术革新看，军事技术似乎没有解释力；军事组织上，中国则自秦汉开始就一直拥有强大的常备军和中央官僚机构，西方所称的现代性国家要素对于中国来说，似乎是一种早已具备但衰落于近代的状态，不是国家形成的新变量，也没有解释力。因此，军事视角下解释中国国家形成的主要变量就聚焦在了战争上。方德万（Hans J. van de Ven）是持这一视角进行解释的翘楚。方德万提出一个重要却研究的非常少的问题：战争如何形塑了现代中国？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几场重要战争（battle）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战争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中国的政治、战略趋向、中国国家形成的结果、政党政治或者其它类型正式团体的权势，均受制于战争的影响。<sup>④</sup>战争对国家形成的作用有诸多细节性的表现：中国军事专家的权势是现代化军队的重要后果之一；列宁式的政党是现代军事的产品之一；早期的根据地及后来的政权类型是由其军事传统形塑的；命令经济是象现代军队那样管理经济的一种努力。战争装置中的理性管理和官僚化分配被广泛运用到了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工作单元、生产队都是实现革命的军事特征的（militaristic）手段。<sup>⑤</sup>西方中国学中，方德万关于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探讨已经引起了重视。另外，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国本土没有军事技术和军事组织优势，但是，考虑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军事技术、现代军事组织均为国外移植而来，为新添附之物，这些新添的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对中国现代国家形成是否构成了的影响？目前学界似乎也尚少有研究。

## 七、军事视角国家形成理论的今天：新生代国家形成理论

军事视角的国家形成逻辑延伸下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当下，军事视角的解释如何更新？新生代的国家形成理论对老一代的理论有何反应？新生代的国家形成理论致力于对当下国家形成问题的研究，对于老一代的国家形成理论，他们中有些是批判性的，有些则提出了建设意见。持批判态度的新生代理论认为，战争不但制造国家也制造国家的消失。珍妮佛·米利肯以20世纪的国家形成理论背景认为，国家形成也可能出现非法政府仅仅和有组织暴力工具接合而不要国家的其他组织所形成的战争—制造（war-making）的情况，此时的国家形成并不是完整的。而且由于现代武器的使用，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会受到腐蚀。<sup>⑥</sup>乔治·索伦森甚至认为，如果放到第三世界国家案例中，战争—制造不但不是国家形成的积极要素，而且可能是使国家崩溃的要素。<sup>⑦</sup>戴安·E·戴维斯、安东尼·W·佩雷拉等提出“什么时候、如何和为什么武装力量重要”<sup>⑧</sup>以及如何解释“现在”和近期的国家形成的问题。他们认为传统的国家形成理论过于囿于军事与政体类型（民主政体、威权政体、极权政体）之间的联系而没有看到军事作用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仍然存在。他们非常强调传统国家形成理论虽提到但却没有重视的非规则武力（irregular forces）的作用，在早期国家形成理论模式中，非正规武力只被当作常备军形成和国家形成不重要的前奏，而他们认为非正规武装力量在政治发展和国家形成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们将研究焦点扩大到次国家、跨国政治和强制行动者方面。认为军队内部的部门、其它强制力量比如准军事组织、警察、情报机构或者民兵组织、管理非战时的个人惯例的出国出境的军事都在当下的国家形成中起作用。

## 八、结论

军事要素的存在使得欧洲原有的各种类型的代议封建型国家整体上都朝现代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了现代国家的普遍形成。在此普遍趋势下，各国所形成的现代国家又是有显著差异的，东西方之间有差异，西方欧洲内部也有差异，具体到西方欧洲内部，基于差异可以把它们的国家形成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主要解释本文称之为代议官僚型国家和集权官僚型国家的形成。在每种类型的国家形成中，国

家形成的军事视角都提出了精细的解释。军事要素是所有类型的国家形成的原因,而其对国家形成的作用机制的不同或者与其它变量互相作用的差异,则造成这些国家走向不同的国家形成道路,最终形成不同类型的国家。军事要素在国家形成中具有一般性的作用,这个作用在中国也可能存在,而相对于新生代的国家形成而言,军事要素本身是一个更微分化的体系,其作用也可能造成相反的国家形成问题——国家消失。

## 注 释

- ① Diane E. Davis, Anthony W. Pereira, *Irregular Armed Forces and Their Role in Politics and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
- ② [英]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8-108 页。
- ③ Geoffrey Park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
- ④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4.
- ⑤⑥ [美]麦尼尔:《角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6、70-164 页。
- ⑦ Richard Bean,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73, Vol. 33, Number 1, pp. 203-221.
- ⑧⑩ [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31、275 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63-538 页。
- ⑪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48-458 页。
- ⑫ Brian M. Downin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0.
- ⑬⑭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0、4 页。
- ⑮⑯⑰⑱ Porter D. Bruce,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Free Press, 1994, p. 13, p. 8, p. 60.
- ⑲⑳ [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6、100 页。
- ㉑㉒ [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2、146、84 页。
- ㉓ [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
- ㉔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 页。
- ㉕ [英]桑德拉·哈尔珀林:《现代欧洲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 页。
- ㉖㉗㉘ [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5、29-30 页。
- ㉙ [美]维克多·李·伯克:《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76-81 页。
- ㉚ Finer E. Sumel, “State-and nation-building in Europe;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99.
- ㉛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9-90 页。
- ㉜ [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 页。
- ㉝ Tuong Vu, “Studying the State through State Formation”, *World Politics*, January 2010, Vol. 62, Number 1, p. 151.
- ㉞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7 页。
- ㉟㊱ Hans J. van de Ven, “Wa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October 1996, Vol. 30, Number 4, p. 737, p. 749-750.
- ㊲ Jennifer Milliken, *State failure,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issues and respons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 5.
- ㊳ Sørensen, G., “War and State-Making: Why Doesn’t it Work in the Third World?” *Security Dialogue*, September 2001, Vol. 32, Number 3, pp. 341-354.
- ㊴ Diane E. Davis, Anthony W. Pereira, *Irregular Armed Forces and Their Role in Politics and State 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8.

[责任编辑 刘金海]



# Main Abstracts

## Marx and Engels's standard of classes division and the appl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arxist classics

Yang qian Zhao xuechang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Opposed to dividing classes according to income, a source of income or occupation. They confirmed that productive forces,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ivate ownership were the conditions of class formation. Based on the concre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nditions and class formation, we think that controlling over production and surplus labor are the standard of classes division. Possess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trolling over production havn't the same meaning. Possession of surplus labor and controlling over surplus labor havn't the same meaning also. The standard is convenient to class analysi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class policy.

**Key words:** The standard of classes division; Controlling over production; Controlling over surplus labor

##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oretical syste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in view of Philosophy

Chen Hongjuan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mak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become possible.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development intersubjectivity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subject,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which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but also change the original social relations.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base make the superstructure develo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i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which promot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develop.

**Key Word:** In view of Philosophy; Theoretical syste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The practical logic

## State Formation in Military Perspective: Military Effect and State Formation

Yang Ying

**Abstract:** The military perspective of state formation put emphasis on the military effect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some explanations in this perspective established the causal chain between the military factors and proposed causal mechanism. These explanations believe that factors such as war, military organizations,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led to state formation, yet owing to their different causal mechanism, different types of states formed. Some scholar in military perspective claim that the military effect to state formation can be a general conclusion. Some other scholar point out specifically that the military effect works in China case. The new generation of state formation theories holds that the old ones were out of date. They find the state formation more complex, or claim it's inapplicability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ey proposed significant challenge.

**Key words:** State formation; military effect; the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state; th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ic state; the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tic state; causal mechanism